

俞辛焯

著作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各 俞辛焯著 筆 勢 力 と 合 流 し て 北 伐 を 夢 行 し て 清

朝 政 府 を 打 倒 す る 計 画 を 決 め た

し の 新 蜂 起 を 招 致 す る た め に 孫 文 は 広 州 に

も 日 も 近 い ベ ー ナ ス 式 の は 日 本 を 根 拠 地

と し て 利 用 す べ き だ ろ う と 思 っ た

ラ ン ス 委 局 は 既 に 孫 文 を べ 第十 卷 へ か う 追 放 し

日 本 も 一 九 〇 七 年 三 月 中 旬 に 唇 槍 舌 劍 の 九 一 八 事 変

ら 退 去 す る 措 置 を 取 っ て お り 時 期 的 な 中 日 外 交 上

日 本 は 秘 かに 横 濱 に 上 陸 し ち 急 ぎ 支 那 領 土 に 進 出 し

俞辛焞 著 作 集

第十卷

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

俞辛焞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前 言

外交与军事是抗日战争前日本对外政策的两翼。研究在战前日本外交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九一八事变，应把外交和军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往的研究多是侧重于军事研究，以关东军和日本陆军中央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本书则把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外交作为研究对象，在主要研究日本外交、特别是日本外务省在此期间的对策和作用的同时，也研究中国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

中外学界把1928年6月日军炸死张作霖作为九一八事变的起点，把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终点，这已成为一般的通论。现今学界对1928年至1930年的中日外交研究已较为充分，并出版了几种专著。为此，本书拟着重研究和阐述1931年9月至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期间的日本与中国的外交。

九一八事变虽因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而大体结束，但“满洲国问题”却一直延续到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并成为日本战争外交的一部分。所以，本书还想进一步从日本军事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来探讨1933年至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为止的伪满问题。

所谓外交，在狭义上是指通过国家间交涉来处理对外关系，即以外交部门为中心来处理涉外事务；在广义上则是指某个国家

的外交政策和各种对外交涉等。本书所要探讨的，是广义上的外交，即以外交政策和对外交涉为中心的中日外交史。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名称问题。日本在事变初期称为“满洲事变”，在当时，中国则称为“东三省事件”或“奉天事件”，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也曾称作“满洲事变”，后来才改称为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已经成为历史，它是 60 多年前的那个不幸时代的产物。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变化，现在的中国和日本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因此，我们能够使用中日双方的历史资料，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有关九一八事变及中日外交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并对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加以研究比较，这是从那个不幸时代的历史教训中得到的中日友好的恩赐。中日两国人民今后还将从九一八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历史教训，并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努力。我研究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外交史并出版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此。如果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促进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并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我将感到荣幸之至。

九一八事变和伪满问题涉及中国和日本的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现在的日本孤儿问题，就是九一八事变和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由于历史资料不够充分等原因，九一八事变的研究还会留下许多不明确的地方。特别是日本军部与内阁、外务省的内在关系，以及中国对事变的外交政策等等，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的终结，而是新的研究的开端。

本书集中了我在国内和在日本研修期间的研究成果。根据南开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的学术交流协定，我有幸在上述两所日本的大学研究九一八事变这个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也是中日两国间学术交流的产物。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对早稻田大学和爱知大学表示感谢，同时对恩师吴廷璆教授和对本

书写作予以指导、协助的大畑笃四郎教授、江口圭一教授和安井正幸、马场公彦等日本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原用日文撰写，于 1986 年 9 月由日本的东方书店出版。作者对一些章节做了增补和修改，由朱庆余、李树果两位译成中文，在此致谢忱。

俞辛焞

1995 年春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万宝山事件与中日交涉	19
一、万宝山事件与土地商租权问题	19
二、日本与东北当局的交涉	25
三、日本与南京政府的交涉	36
四、万宝山事件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	52
第二章 日本对中村事件的二重外交与张学良的对策	74
一、日本对中村事件的二重外交	74
二、张学良的对策和列强的反应	94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与币原外交	104
一、事变爆发后的对策	105
二、日本在国联的外交活动	113
三、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前后	123
四、日军攻占锦州前后	134
第四章 “一·二八”事变与日本外务省	143
一、事变初期的对策	143
二、日本在国联的外交活动	155
三、围绕停战谈判的对策	163

第五章 南京政府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对策	171
一、南京政府与九一八事变	172
二、南京政府与“一·二八”事变	200
第六章 伪满洲国的成立与日本外务省	218
一、建立伪满政权问题与币原外交	218
二、“一·二八”事变与建立伪满政权的关系	226
三、伪满政权的承认问题	233
第七章 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外务省	253
一、调查团的派遣问题	254
二、对调查团活动的对策	261
三、调查报告与日本的反应	269
第八章 南京政府与李顿调查团	278
一、对调查团的对策	278
二、对调查报告的评论	287
三、在国联的外交活动	296
四、热河作战时期的外交活动	307
第九章 伪满的殖民体制与日本外务省	314
一、日本承认伪满政权	314
二、伪满殖民体制的确立	325
三、傀儡外交与日本外务省	336
第十章 战争与伪满问题	346
一、中日战争与伪满问题	346
二、日美交涉与伪满问题	355
三、终战外交与伪满问题	360
附录一 大事记	368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399

绪 论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外交，是由中国南京政府对日本、对国联、对列强的外交与日本对中国、对国联、对列强的外交构成的。绪论首先综述日本在事变期间的外交和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然后对中日外交加以简明的比较，以达到进一步深入了解九一八事变历史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日本外交，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而后的全面侵华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外交相比较，有其特异性。这种特异性是由于九一八事变是以特殊的形态爆发的，而且是在国际联盟已成立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这里所说的特异性，并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而言的。特异性中包含着普遍性或共同性，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外交的特异性，也是日本外交的普遍性或共同性中的特异性，并不是与以往或而后的外交完全不同的。

近代日本外交的普遍性或共同性是战争外交。战前的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军事和军部在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内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外政策方面，军事和军部也占据优先地位，其对内政策也是为军事服务的。这就是所谓军国主义的特征。因而，处理对外问题的外交，在民主国家不过是实施本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而在军国主义日本却成了推行战争的手段。和民主国家相比较，这是军国主义日本的外交特征，也是

近代日本外交的普遍共同性。

战争外交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前外交、战时外交和战后外交。本书对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日本外交也拟分作三个时期加以叙述。从时间上划分，将1931年9月18日以前作为事变的战前外交时期；将九一八事变至第二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作为事变的战时外交时期；将而后至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作为事变的战后外交时期。从军事上来看，事变的战后外交还应包括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的签订，从外交史的角度来看，还应将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为促其获得国际承认的外交作为战后外交的一个部分。

事变前的日本外交，是两次战争期间，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外交的继续，其外交任务是想首先通过和平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如果外交手段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则诉诸战争。但是，九一八事变是以特异形态爆发的战争，是在关东军掌握挑拨战争的主动权，陆军中央的部分中坚人物的怂恿下，用阴谋手段发动的。这次战争不同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它不是经过阁僚会议、军部首脑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最后裁决，并动用统帅权而挑起的战争。所以挑起这次战争的决策过程，在日本的对外战争史上也是异乎寻常的。日本外务省没有直接参与这次事变的挑拨行动，也没有进行挑起战争的外交准备。没有外交上的准备便突然地进行战争，这是九一八事变的一大特征。

然而，这并不是说日本外务省在事变之前没有起任何作用。事变之前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这两个事件是爆发九一八事变的间接导火线。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日本外务省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万宝山事件是日本想在“满蒙”获得土地租借权，进一步扩大殖民权益的事件。把经济外交作为外交观念之一的币原外相，为了获得这种权益曾几次电训一时动摇并想从当地撤出警官的长春、吉林领事，要求他们以强硬的态度做出最后的

努力。中村事件是由于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为了侦察兴安岭的军事地形而进入该地，被当地的中国驻军依法处死而引起的事件。但日本外务省的派出机构对这种特务活动进行强词夺理的争辩，并想利用这一事件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

日本外务省的这种努力，虽说与关东军的最高目的也即通过武力占领“满蒙”不同，但和关东军想要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权益是一致的。通过外交交涉而没有完全解决的万宝山事件中的土地租借权问题，由于九一八事变而解决了。所以两者试图在“满蒙”扩大日本帝国的所谓国益上，有着共同性。以日本外务省为主导的对上述两个事件的处理，虽被日本的社会舆论谴责为“软弱外交”，但日本外务省对上述事件的强词夺理及其对中国方面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却造成了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舆论，并为之打下了社会基础。这说明日本外务省和币原外交，在通过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而行使武力问题上虽与关东军有所不同，但双方又有共同点和相近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初期，日本外务省和币原外交，在对外问题上与关东军和日本陆军中央所采取的行动大体上是一致的，其根本点就在于此。

但是，日本外务省和币原外交没有为事变采取诸如争取列强的谅解、与特定的列强缔结同盟关系，以及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等方面的外交措施。这也是事变产生的“满洲国”未能获得国际承认的外交上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日本在事变前的外交，既和事变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没有进行直接的开战外交。这正是其外交的一个特征。

那么，事变中的日本外交又当如何呢？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外交的特征之一，便是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这在日本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以往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而后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外交主要是开战外交或“终战”外交，在战争中的外交活动比较少。而在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外交，之所以那么积极开展活动，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中日两国既处于战争状态，又没有完全断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存在着国际联盟组织以及《国联盟约》（即《国际联盟盟约》，简称为《国联盟约》或《盟约》）和《九国公约》。这种特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定的国际关系中产生的。

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是以国联（列强）、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三角关系而展开的。日本对中国、对国联和对欧美列强的外交，虽有直接交涉的一面，但主要是以国联为舞台而展开的。日本为了排除第三国对事变的干涉而主张直接交涉；而中国则想把日本的侵略行径诉诸国联与列强，并想借助国联和列强的力量制裁日本，以期解决事变。因此，以国联和列强为中心，日本和中国便展开了外交上的攻防战。

在这种外交攻防战中，由于日本与中国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因而从根本上说是针锋相对的。而处于中间或中心地位的国联与列强，则对日本和中国采取了双重的外交政策。

何谓双重的外交政策呢？国联是由世界上大小五十几个国家组成的，但它主要代表欧美列强的利益。因而，与国联的关系可以说主要是和欧美列强的关系。欧美列强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具有侵略中国、保护和扩大在中国的殖民权益的共同性，为此而相互同情、合作及支持对方保护既得权益。但日本和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为了扩大各自的权益和势力范围，又相互排斥和相互争夺，因此有时会出现反对对方的侵略并加以限制的情况。这种两面关系便是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双重关系。欧美列强和中国的关系，基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欧美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具有同情与支持的一面，但为了牵制日本对中国的急进性侵略，同时也为了与日本争夺中国，又有利用中国抵抗日本的一面，从而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某些反侵略要求。这就是国联或列强的双重外交政策。国联或列强对中日双方的这种双重的外交政

策，使日本和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这一简单的外交关系更加复杂化了；而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也是在这种复杂化了的三角和双重的关系中展开的。在考察九一八事变期间和而后的中日外交时，需要首先想到这种基本的外交关系。这也是本书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的一个核心的框架。

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特征之一，是在事变初期有过扩大与不扩大的二重外交。这在日本战争史或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罕见的现象呢？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在日本政党内阁时代，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曾是二重外交。这是在华盛顿体制的牵制下，也是在政党内阁的新的政治体制下发生的。这种二重外交一直延续到事变前的中村事件。如果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决策，是通过正式的决策过程，那么这种二重外交则将是经过外务省与关东军及陆军中央的调整，成为对事变的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九一八事变没有依循这样的决策过程，所以20年代的乃至针对中村事件的二重外交便延续到九一八事变，并成为扩大与不扩大的二重政策。

在这种二重外交中，币原外交坚持了不扩大的方针。这个时期的所谓币原外交，代表了币原外相个人的外交观念或外交原则，同时也代表了这个时期的若槻内阁的对外政策。币原外交也有二重性：对内它主张不扩大，并限制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作为代表日本帝国的外交，它为关东军的阴谋的军事行动又进行了全面的强硬辩解，并为了使这种军事行动得到国际性的保障而作了一贯的努力。以往对币原外交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倾向，即侧重于它在事变初期的对内牵制作用，而忽视了它对国联、列强和中国外交上的作用。为此，本书在承认币原外交对内作用的同时，着重研究它的对外作用，并对九一八事变中的币原外交进行全面考察。

在九一八事变中，币原外交的主张是与南京政府或张学良进

行直接交涉。这种直接交涉的主张与币原外交在事变初期的不扩大方针是相互对应的。币原外交是想利用关东军在事变初期军事上的“胜利”，通过与南京政府或张学良进行直接交涉，以解决在东北的 300 多件有关殖民权益的悬案，并收拾九一八事变的残局。这里包含着币原外交的外交观念，即通过非军事的力量来维护和扩大日本的殖民权益；同时也包含着与币原外交的外交观念相反的反协调主义的目的，即试图排除第三国和国联对事变干涉的目的。因此，这种直接交涉也具有两面性。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在保护和扩张本国利益这个基本目标上是始终不变的。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具体的外交政策，不仅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变化多端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相比较，其变动性较大。日本的对外政策也是如此。所以，币原外交也随着九一八事变的进程于 1931 年 11 月中旬发生了转变。币原外交的这种转变，可以从他在撤兵、扩大以及成立傀儡政权等三个问题上得到证实。

在九一八事变中，解决事变的焦点或要害，是关东军撤回满铁附属地的问题。如关东军撤兵，则有通过外交途径来暂时解决事变的可能性。主张不扩大的币原外交，曾赞成 1931 年 9 月 30 日国联行政院有关日军撤退的决议，并试图通过直接交涉来解决事变问题。但是，从 10 月 9 日前后开始，币原外交又在撤兵问题上设置障碍，先后附加了确保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缔结五项大纲协定、成立治安维持会等先决条件，为关东军拒不撤兵的行动制造了外交上的借口。

在扩大事态的问题上，币原外交是沿着从不扩大向“和平”的扩大，进而又向军事性的扩大这个方向转变的。9 月 21 日关东军占领吉林以后，在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和国联行政院要求日本撤军决议的牵制下，曾一度停止公开的军事行动，但暗中利用张海鹏等旧军阀势力北进。这是所谓的“和平的扩大”。对此，币

原外交曾给予赞同与合作。在 11 月上旬和中旬日军攻占嫩江与齐齐哈尔的问题上，币原外交最初予以反对，但最后则赞成占领齐齐哈尔。

主张不干涉内政的币原外交，在事变初期曾反对建立傀儡政权，甚至对参与此事也表示异议。然而，后来也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是沿着为成立作为傀儡政权之基础的地方治安维持会进行辩护，而后赞同成立治安维持会，进而又同意将张学良政权从东北驱逐出去的方向转变的。

币原外交的上述转变，主要是在 1931 年 11 月中旬关东军侵占齐齐哈尔前后发生的。至关东军侵占锦州时，军事行动和币原外交已经相互协调并大体一致了。

币原外交的这种转变，在研究和评价币原外交以及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日本外交时，都是重要的问题。当时日本驻奥地利公使有田八郎就承认了币原外交在日军撤退问题上的变化。南京政府也曾认为，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日本的二重外交结束了，币原外交也转变了。在有关研究九一八事变史或币原外交的著述中，也有承认这种转变的。^①这些事实表明：币原外交在其告终的一个月之前，便已经改变了事变初期的日本外交。

币原外交的这种转变，是它的内在本质和对客观形势的认识促成的。币原外交试图解决 1924 年加藤内阁时期以来的“满蒙”悬案，并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在“满蒙”的殖民权益。这是币原外交的本质。这种本质与关东军和日本陆军中央是一致的。但是在

① 白井胜美在其著作《满洲事变——战争与外交》（中央公论社 1974 年版，第 124 页）一书中，便明确地记述：“币原外相在 11 月 12 日就满洲问题向驻意大利、美国和中国的大使或公使传达了政府的方针，15 日又向芳泽代表训示了有关对[国联]行政院的对策。从这一系列的方针来看，币原外相的见解已经明显地改变了以往的币原外交路线。”原外交官斋藤镇男著述的《日本外交政策史论序说》（新有堂 1981 年版，第 52 页）也说：“币原外相在第三次任外相时也没有改变他的外交观念。但在处理具体的外交问题时，则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形势的进展，他以往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他对国联有关满蒙问题的训令中看得出来。”（文下黑点是斋藤所加）。

事变初期，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是否通过军事占领来一举扩大殖民权益，并将这种权益一直推进到成立傀儡政权的问题上。然而，这种分歧不过是达到目的程度和手段上的区别。因而，虽然对内来讲，币原外交和军部存在着分歧，但从对外来讲，币原外交又为关东军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并一贯努力为之造成有利的国际舆论和国际环境。这种一致性是币原外交发生转变的内在原因，并最终成为币原外交与关东军和陆军中央大体一致的基础。

币原外交的转变还与它对客观形势的认识变化有关。币原外交考虑到日本对英美的经济依赖和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并曾担心苏联的军事干涉。但是，欧美列强与苏联对日本是妥协的，并没有采取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的手段。因而，币原外交对制约其协调外交本质的客观形势认识上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成了币原外交转变的客观原因。

币原外交的转变，是客观外交活动的变化。至于当时币原喜重郎本身是怎么想的，以及他的外交活动与外交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问题，由于缺乏确实的史料，只能有待将来进行研究。

“一·二八”事变期间的芳泽外交，无论对内对外，从一开始便与军部协调一致，日本外务省和军部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芳泽外相和陆海军大臣共同决定向上海出兵，并主动要求列强介入与合作。军部也同样希望列强介入。这一情况表明：“一·二八”事变期间的芳泽外交与九一八事变期间反对列强介入的币原外交是不同的。这是“一·二八”事变的特异性所产生的现象。“一·二八”事变的主要目的是转移列强对成立伪满洲国的注意力，并想牵制列强对成立伪满洲国的干涉。因此，日本在列强殖民权益集中的上海挑起事变，以便把列强卷入其中，使列强的注意力集中到上海。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中采取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一是军部所采取的政策，挑起事变并激化了日本与列强的矛盾；

二是以外务省为主而采取的政策，将列强卷入事变并与之协调或妥协。这两种政策作为手段或方法是相互矛盾的，但在为了转移列强视线的目的上又是一致的。

正如日本预料的那样，列强被卷入了“一·二八”事变，并暂时从成立伪满洲国的事情上转移了注意力，使得伪满洲国在没有列强的特别反对下成立了。但是，“一·二八”事变激化了日本与列强的矛盾，反而起到了难以获得列强承认“满洲国”的作用。

事变后的外交问题怎样呢？

伪满洲国只是日本的殖民地，作为一个没有国家主权的殖民地来讲，本没有什么外交问题可言。但是，伪满洲国又采取了“独立国家”的形态，因此，围绕着伪满洲国的外交问题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外交，一是确立日本的殖民体制；二是承认伪满洲国以及争取列强对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这种外交首先是从内田担任外相时期开始的，一直延续到 1945 年战争结束。事变后的外交持续这么久，这在日本对外战争史或外交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事变后日本对伪满外交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两面性。从背后来讲，是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共同为了调整 and 确立其殖民体制而奔波，但在表面上又不遗余力地粉饰其殖民地傀儡政权的所谓“独立性”。当时日本拓殖省将这种两面政策讽刺为“挂羊头卖狗肉”。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事实。

在确立殖民地体制上，日本表面上承认伪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但在背后又缔结各种条约，采取从法律上确立和保障其殖民体制的种种措施。随着对伪满的殖民政策的实施，这种两面性便失去了均衡，殖民地的傀儡性愈发暴露，表面的“独立”形式反而妨碍了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因此，继续粉饰其所谓的“独立性”已经没有必要了，日本外务省也逐渐被排斥在伪满的殖民统